



■宁夏革命英烈■

马少林：为党的事业英勇就义

邢万莹

马少林（1905—1947年），1905年生，宁夏中宁县彰恩堡人。

马少林自幼家境贫苦，八九岁时给人放牧。后由于父亲积劳成疾，马少林便给有钱人当雇工。

宁夏虽处祖国西北边陲，但党在宁夏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加上宁夏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批有觉悟的青年都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孙殿才系中宁县彰恩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统战部部长，后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当时化名赵忠国。宁夏离三边并不遥远，所以，一些革命的信息也不断传到宁夏，当家乡人知道孙殿才在三边当部长、共产党为穷人闹翻身解放的时候，对家乡人也有很大的影响。马少林得知这些消息后，更有着到三边去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

1943年，马少林以做生意为名，来到了解放区定边，在党接头转关系的地方“广发西”商店见到了彰恩堡老乡杨学智。当时，

他知道杨学智为“广发西”炊事员，于是经杨学智引见，他见到了孙殿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显得是那样亲切，他把所有的苦难、想法告诉了孙殿才。孙殿才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真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一心要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1944年，经孙殿才介绍，马少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少林入党后，在三边地委统战部做联络工作。为了掌握宁夏的情况，他经常来往于定边、灵武、吴忠、中宁等地，传递信息，搜集情报。不但与地方打交道，还多次到国民党宁夏军阀马鸿逵所率八十一军驻地中宁南营房等处，同孙殿才的亲戚、时任该军特务营司书的孙克仁和一〇三团少尉军需官张风元进行秘密联络。通过他们，获取了不少军事情报。同时，他还启发、教育、引导孙克仁、张风元、张俊、柳洪四人弃暗投明，于1945年8月到定边参加了革命。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在胡宗南、刘勤等人带领下大举进攻延

安。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与敌在陕北周旋。此时，驻扎在三边地区的部队也均撤走，国民党敌特机关以为大势所趋，肆无忌惮地搜捕地下工作者。马少林在定边陈家大墩遭敌暂九师便衣特务何兆元、杨怀义逮捕，随即被押往吴忠警察局监狱。敌人用尽酷刑，拷打审讯，但马少林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敌监狱长也说，马少林是个硬骨头。7月，马少林被送到国民党宁夏军法处，敌人变本加厉的进一步施以酷刑，但他们从马少林口中仍然一无所获。特务何兆元、何永德、何洪寿为了邀功请赏，联名上书马鸿逵，证明马少林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为孙殿才工作，要求枪杀马少林。

1947年10月16日，马少林在吴忠秦桥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呼革命口号、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在刑场周围的群众，无不被他的浩然正气所感动。

马少林烈士是中宁人民的骄傲，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宁夏党史大事记（二十四）

邢万莹

1941年4月 崔景岳等人牺牲后，白玉光、马云泽、王博等中共党员又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在被捕的人员中，除16名共产党员外，其余人员多为各校的进步教师，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保释出狱。白玉光、王博、马云泽、王世同、姚怀廉等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雍民飞，一直被监押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

1941年8月 中共党员何自成、曹松林、毛达等人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被上级党组织分别从湖南、重庆、兰州等地派往宁夏省城，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何自成被“回民救国会”推荐，应聘到宁夏中学任教，担任庶务主任。在教学中，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向进步学生介绍《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等进步书籍。

1942年3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召集孙作宾、郑重远、陆云龙、吴治国、罗杨实等人座谈党在甘肃的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中共甘宁工委，以利于甘肃工作与宁夏工作密切配合，推动宁夏开展工作。

1942年4月 中共甘宁工委正式成立，孙作宾任书记，陈成义、李仰南等人 为委员。新成立的中共甘宁工委派穆德彪到宁夏工作，李仰南到盐池和何广宽取得联系后到三段地开展调查。

1942年9月 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决定成立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何广宽任工委书记，许宗岳任组织部长，江云任宣传部长。中共金灵工委机关设在盐池县曾家畔，主要任务是开展以宁夏省城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搜集马鸿逵党政军等各方面情报。

1942年9月 宁夏省邮政局邮务佐李培源使用光华钞票（即解放区通用货币）嫖妓被拘捕。在审讯中，李供出钞票是毛英华、凌蕃给的。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借口毛英华、凌蕃传播光华钞票，将他们逮捕。当时何子成正利用暑假去定远营旅游，期间秘密绘制了一张阿拉善旗地图，引起敌人的怀疑，在返回省城途中，被敌人逮捕。之后，敌人又逮捕了曹松林、姚益庭、陈硕夫、刘斐等人，王广仁因事先听到风声，逃离了省城。

1942年12月 中共西北局决定将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为了充实机关工作，许宗岳、江云被调往中共三边机关工作。

1943年1月 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后改为地委）决定，宁夏工作主要由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负责，赵忠国（孙殿才）担任分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固原地区的土地改革

解放之初，固原地区隶属于甘肃省，包括固原、海原、西吉、隆德、化平（1950年9月改称泾源县）5县，共32个区241个乡。

1950年初，开始了减租减息。1951年9月，固原地区各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各县结合实际，纷纷制定了土地改革的计划或方案。

固原地区各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分四期完成。第一期土改试点，共开展21个乡，从1951年9月至1952年2月；第二期开展95个乡，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第三期开展31个乡，从1952年2月开始，因发生“四·二”叛乱而中止，一直到平叛基本结束后才继续进行；第四期开展97个乡，从1954年2月中旬至3月底全部结束。

固原地区的土地改革，以1952年的“四·二”叛乱为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1年9月至1952年4月初，主要是分期分批开展土改试点及土改的全面铺开。从9月初开始，各县分别召开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三级干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部署本县的土地改革工作。9月下旬，各县的土改试点工作陆续开展起来。

第二阶段，从1952年秋至1954年3月

底，在“四·二”叛乱平息后重新开始土地改革工作。

“四·二”叛乱平息后，1953年12月，西海固地委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西海固地区在今冬明春结束土地改革工作方案》，指出：在这一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应采取宽松、温和、谨慎、稳妥的方针进行，不开诉苦会 and 斗争会，严禁体罚，防止在农村形成过分紧张的局面；清真寺、道堂、拱北的土地一律不动；对地主的畜牧业、工商业部分一律加以保护；富农出租的土地一律不动；对地主成分的民主人士一般予以保护过关；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不得毁坏；对群众中的典当关系和借贷关系承认其继续有效。在斗争策略上，不提诉苦问苦口号，不开对地主面对面的斗争会，对其不挖底财也不追究分散转移的财产。1954年1月，西海固地委发出《关于今冬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工作方案（草案）》，规定：不论农民原有或土改分得的土地、房屋和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一律发给土地证、房屋证，并将原有契约一律作废。

1954年1月下旬，固原地区抽调600余名土改干部，集中进行培训，组织学习《西海固地区在今冬明春结束土地改革

工作方案》和甘肃省1951年10月颁布的《关于干部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应遵守的十项纪律》等有关文件。2月上旬至3月底，土改干部深入固原地区的12个区、66个乡开展了土改工作。此外，隆德县于3月下旬完成了6个乡的土改“补课”工作，泾源于4月中旬完成了土改。至此，全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胜利结束。固原地区的土改采取了“宽松、温和、谨慎、稳妥”的方针，强调民族团结，尽量缩小打击面，平稳解决了土地改革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土地改革使宁夏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普遍掀起，农村基层政权得到加强，党的农村支部及青年团、妇女、民兵等群众组织也逐步建立，使农村呈现出新气象。但是，从整个土地改革的工作来看，也存在着一 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程度不同的发生过包办代替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妨碍了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充分发挥。

（据固原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五十五期

YI MIN SUI YUE

余里人：支宁建设 无怨无悔(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余里人：听力不好已经有50多年了，那时候工作特别拼命，当时要出农场的五年规划，没有打字机，全是手刻蜡板，然后油印，连写带刻蜡板、再印出来用了七天六夜，这份工作别人代替不了，只有自己坚持，工作完成后大病一场，听力就不行了。后来还有人告诉我，是青霉素和连霉素混合使用造成的，听力下降对我的打击很大，很是灰心了一段时间。

1965年，宁夏农垦改为农建十三师，农垦职工也变成了军垦战士。大批北京、天津的知青来到这里，因为条件艰苦，有些人不长时间又跑回北京，开始上访，国家有关部门派出干部，动员这些北京知青返回宁夏，这时候的余里人已被抽调到师下属的一个团政治处，上级领导又指派他到北京，承担劝返上访青年返宁的任务。到北京后，每天挨家挨户做知青的思想工作，耐心劝导，50多天后，终于把大多数上访的北京知青接回宁夏。因北京知青多数在平吉堡农场，很多知青在他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余里人又被调到了平吉堡农场。

北上接知青的工作他完成的很圆满，但那次的北上让他的生活很不圆满。在北京50多天的劝导中，他与远道来宁探望他的母亲错失了难得的见面机会。为了母亲那次来宁夏，他用尽了心思。

余里人：我母亲不识字，口音也比较重，只能听懂老家话，我怕她路上碰到困难不好办，就提前写了个胸牌先寄回老家，胸牌上写明需要坐什么车，哪里转车，终点是哪里。母亲就是靠着这个牌子，在路人的帮助下来到宁夏，不巧的是，我要离开银川时母亲已经上路了。我接到的这个任务根本没有推迟和换人的可能，时间太久了，母亲也等不住，又回了老家，真的太遗憾了。

刘云香：他去北京接知青返回时我生孩子才刚刚21天，还没出月子，没办法，他放下我们母子就去了北京。我婆婆从老家来看儿子，住了40天，没见到儿子的面，只好又戴着牌子回了老家。

浙江支宁青年先后来了几批，共9万多人。当年这些优秀青年满怀激情来到宁夏，但后来大部分人又重返家乡。来时

从浙江来的支宁干部——王炳功(五)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65年，三十三团分来了一批北京知青青年，这群生龙活虎的男女知青，既给农场带来了活力，也对农场管理工作带来挑战。王炳功作为团长，满腔热情把北京知青安排到农场新建的新营房里居住，也领他们去看了当年老军工居住的“地窝子”，听一听老师长刘奇功在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的故事。这些年轻人很受感动，慢慢在暖泉农场安下心，从手握锹把挖土开始，到使用小车拉土运肥，各种农活渐渐学会。在生产劳动中，难免百密一疏发生意外。据北京知青程思樵回忆：“在二连冬季挖沟会战中，兽医站的战友康学禄连队，本来没他的事，却主动要求上工地干活。由于天寒地冻，冻土层很厚没法挖，只好用炸药炸。没想到就是这一炸，飞上天的冻土块落在康学禄的头上，造成他颅内出血，不到3个小时就离开了人世。为此，农场召开了追悼大会，团长王炳功为他扶灵，把他下葬于东干渠的高地上。”一位知青遭遇不幸，王炳功组织全力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作为领导，发生这样的不幸，痛惜与自责萦绕于心。他作为长辈、领导为死者扶灵，就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既表达了对知青康学禄为农垦事业意外牺牲的沉痛哀悼，也体现他对农场干部职工，特别是上山下乡北京知青的高度尊重和关爱。

长山头建场，职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从各农场抽调到长山头的几十名干部职工，二是陈麻井公社整体移交的农民；三是1980年固海扬水工程竣工后转移到农场的1200名临时工。除原陈麻井公社的农民有自己的住房外，其余1000多人住的都是帐篷和地窝子。饮用的是浑浊的同心扬水干渠的黄河水和含氟量较高的机井水。身为农场筹建领导小组负责人 的王炳功，在抓农场建设和生产的同时，没有忘记广大拓荒者的疾苦，多次向上级反映。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和农垦局局长刘寅夏曾两次下场来，听取农场职工的呼声和意见。1979年8月，又专程到长山头考察，落实了从米钵山的小洪沟铺设管道将山泉水引到各生产队，半年多的施工，铺设了总长40多公里的引水管线，使农场职工喝上了甘甜的山泉水。农场经过了3年的努力，自建两座砖窑制砖瓦，建起了25栋共250间砖木结构的住房，使近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拓荒者住进了新房。

正赶上低标准时期，宁夏的生活条件比浙江差很多，饥饿让他们放弃了坚持。浙江省后来还为此出台了专门的政策，对重返家乡的支宁青年给予特殊的照顾和安排，户口、工作全部得到落实。

这时候余里人老家的公社也给他发来电报，希望他重回浙江，并承诺给安排工作。他谢绝了老家的诚意，坚定的留在了这里。

余里人：1962年，农场派给我一项任务，就是护送浙江省德清县两名支宁青年重回老家后留下的孩子，我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小余这次送人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可我把他们送回老家后又返回了宁夏，我一回到农场，大家都特别的吃惊。其实我对老家也是很留恋的，毕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老家的生活比宁夏强得多，但我总在想，当年报名来宁夏时我向组织上做过保证，就是支援大西北，争当先进、不当逃兵。

1960年5月，刚满18岁的余里人满怀激情从美丽的千岛湖老家出发，来到很远很贫穷的宁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60多年，将建设祖国的一腔热情播撒在这里。在亘古荒滩上，同所有垦荒者一起，用激情和汗水，开垦出一片片粮丰果繁的沃土田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85年，43岁的余里人被提拔到农垦局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又干了18年，在这个位置上，他除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最大的付出是帮助职工发展自营经济，引导职工养殖、开荒，改善职工的生活。余里人说：“职工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这是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让我感到安心和骄傲的事情。”

1988年、1993年，余里人先后两次出席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1998年，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

今年79岁的余里人说：人生的道路上，衷心地感谢党的培养和教育，感谢宁夏这片充满发展潜力的热土，还应该感谢我岳父岳母，感谢我的妻子，是他们的支持坚定了我扎根宁夏的信心，让我有了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和现在。

（蔺银生 马君武 王旭阳 整理）

为了使2000多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王炳功和刘寅夏多次向自治区领导反映请示。李学智也在一次赴京开会时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汇报，请求国务院给予支持。国家劳动总局根据指示，委派专人赴宁夏长山头调查，他们被长山头2000多职工冒着狂风大雪修渠挖沟、平田整地的劳动场景所感动。1983年终于破例批准长山头农场2200多名符合条件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从而凝聚了人心，稳定了垦荒队伍，加快了农场的建设和发展。

忠诚党的事业、关心群众生活是王炳功一生为官做人的真实写照。

刚来宁夏担任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的王炳功，全家分到了两间里外屋的土坯房，当他听到一名职工结婚找不到房子时，二话没说，将外间腾给了那位职工做结婚用房。自己一家4口吃住在里间。20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决定给时任农垦局副局长 的王炳功涨一级工资。他婉言谢绝，并让给了低工资的其他同志。甚至在退休问题上，王炳功凭着资历是可以延后几年的，但在卸任长山头农场筹建工作之后，他就以身体原因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请，想把位置留给正逢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同志去施展抱负。他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整个农垦事业的后续发展问题。

王炳功一生为党和人民任劳任怨地工作了近50个春秋。他在宁夏垦荒造田事业上付出了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他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形象，是暖泉农场、长山头农场乃至宁夏农垦干部职工心目中的好干部，也是子女心目中威严崇高的好父亲。王炳功从浙江带来支宁来的时候，组织上曾经叮嘱他“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建设好边疆！”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可以毫无愧疚地对世人说自己不仅已经做到，并且做到了极致。在他的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家风熏陶下，他的4个子女，有3个在农垦系统继承父辈的事业，并在不同岗位上成长为带头人。他的长子王树林成了第九任农垦局党委书记、局长。正因为有了他这样正能量的榜样，才能使子女个个成才，人人优秀。这在当年浙江支宁大军中也堪称美谈。王炳功真正做到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88年王炳功因病在银川去世，终年68岁。后人将会铭记王炳功为宁夏农垦事业所作的贡献。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